

反思与批判——

作家和学者笔下的高考

本报记者 吉祥

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，围绕在高考身上的光环与争论便不曾消失。2015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一周，但社会上关于高考的议论依然很热。本期“书坊”周刊，我们分两个方面走进高考：一是作家笔下的高考，重在书写记忆与故事，当然细微处仍可观察高考在社会中的独特作用；二是学者特别是教育家笔下的高考，重在反思与批判，既有对高考问题的揭露归因，也有对高考改革的建议。

作家笔下的高考：压力与感恩

高考期间，作家莫言的一篇旧文流传甚广。在这篇《陪女儿高考》的散文里，莫言讲述了女儿高考时，他这个陪考家长的一天。如同我们寻常见到的陪考父母一样，他和妻子焦虑而无助，看到车牌号是575，心中暗喜：“也许就能考575分，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。”一旦看到车牌号数字较低，就觉得晦气。而莫言笔下的女儿，考前一晚仍在紧张复习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，次日早起之后又是胃口全无。这让莫言想起了他的奶奶。早年家乡闹日本鬼子，“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，我奶奶就往厕所跑。解放后许多年了，我们恶作剧，大喊一声：鬼子来了！我奶奶马上就脸色苍白，把提着裤子往厕所跑去。唉，这高考竟然像日本鬼子一样可怕了。”

作为陪考家长，莫言与众多家长一样在烈日下等待，耳边是家长们不断变换的各种话题。尽管陪考备受煎熬，但作家也感慨：对广大老百姓的孩子来说，高考是最好的方式，任何不经过考试的方式，譬如保送，譬如推荐，譬如各种加分，都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性。

这篇陪考文章收入莫言的散文集《会唱歌的墙》里。实际上，这不是莫言第一次记录高考。早在1986年，莫言便在老家高密中学里体验生活，直观感受了高考带给学生的压力，以及很多贫困学生对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渴望。之后，莫言创作了小说《欢乐》。小说里的人物永

乐生长在高密县的农村，家境贫寒的他像千千万万个农村孩子一样，希望通过高考跳出农门，摆脱贫穷与落后的命运。不过，连续5次参加高考，次次败北，希望化为泡影。莫言在“文革”时辍学，没有参加过高考，但对大学一直心存向往，在《我的大学梦》中，莫言详细记录了没能上大学的痛苦，以及对继续读书的渴望。“于是我想到了当兵。当了兵，只要好好干，就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。”最终，莫言参军，并因出色的文学才华得以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

提到高考，不得不提的就是1977年“文革”结束后的首次高考。这次高考因为改变了众多人的命运，至今被反复提及。几天前，齐鲁晚报报道过1977年的高考语文试卷，只有三道题，看上去虽简单，但是考虑到当年的考生已经被“文革”耽误了十年，得知高考恢复的消息后，这些18—30岁的青年从农村、工厂、牧区、学校和机关涌向考场。据悉，1977年高考的报考人数为570万，跨过这道门槛的仅有27万人，录取率为4.7%，竞争可谓惨烈，而那些成功从高考突围出来的人，很多在后来的成为了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人才。

《我的1977》这本书汇集了众多作家回忆高考的文章。陈建功、周国平、肖复兴、叶兆言、吴思、雷颐等近二十位有着77、78级高等教育经历的文化精英撰写高考回忆文章，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的个人入学经历，可

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见证。

以作家叶兆言为例，1977年高考之前，他在工厂工作，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，叶兆言匆匆上阵，却不幸落了榜。“落榜对我是个很大的刺激，因为我发现自己很笨，很糟糕，根本就不是上大学的料。”第二年，倔强的叶兆言放弃了读工人大学的机会，第二次参加高考。尽管最终考上了理想的大学，但对填报志愿这些事情却是毫无概念，“录取什么就读什么，能进大学门就行”。

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。他说，现在谈1977年的高考，不能遗忘那些未能考上大学的人，“77、78级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神奇，这代人的成功，只是从一个特定角度折射了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。”

很多作家都在文章或书籍中回忆过高考。作家方方前两天就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1978年的高考准考证，那时的方方还是一名搬土工。“感谢高考，让我实现梦想，成为武汉大学中文系七八级这个最温暖集体中的一员。也因此让我有了现在这样的工作和生活。不然我很难想象一个早已下岗的搬运女工今天会生活成怎样。”方方直言，正是这张小卡片，改变了她的命运。

此外，著名作家余华还曾写过《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》，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张曼菱则在去年出版了《北大回忆》，留下了那个年代大学生活的诸多细节。

学者笔下的高考：反思与批判

《北大回忆》出版后，著名学者钱理群参加了该书的研讨会。在发言时，钱理群批判现在的很多北大学生将北大当作成人上人的阶梯。他说，一位北大人士告诉他一个典故，北大西门口有座小金水桥，今天已经被络绎不绝的参观者称为“状元桥”，“朝进北大门，暮登天子堂，和我们以前的梦想已经大不一样了，这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。”

这不是钱理群第一次批判教育，从北大退休后，他曾回母校南师附中任教，不料来听课的学生一次比一次少，一位学生给他写信说：“钱教授，我们不是不喜欢听您的课，而是因为您的课与高考无关，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；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毫无负担地来听您的课。”这让钱理群感慨应试教育“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”，“一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。而应试教育恰恰是反教育的”。

长期关注教育的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，在其最新的评论集《近忧远虑》中，批评了高考乱加分以及对高考试卷的过度炒作。在书中收入的《少数民族考生的分应该如何加》一文中，葛剑雄建议，对申请加分的考生应该加试该民族历史文化。他同时指出，对报考全国重点大学的考生不能加分，因为这些学校要求高，竞争激烈，如果勉强录取，不利于他们的学业。《葛剑雄文集·冷眼热言》同样有多篇谈论教育以及高考的文

章，比如他批评社会上对高考的过度关注，他以高考期间气象部门发布的过于“精细”的气象预报为例说，“对服务部门来说，提供超常的服务也不无风险。像这样‘精细’的天气预报，如果出现误差，考生及家长告你误导或造成心理损失怎么办？岂非自找麻烦！”

2015年高考期间最大的新闻当数《南方都市报》记者“卧底”替考组织，并成功以“枪手”身份进入考场。2014年初，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指导本科生，将三年的教学成果汇集成了《科场现形记》一书。在这本书中，郑也夫的学生们借助调查展示了中国高考中的各种“黑幕”。一位被访者详细介绍了家长和考生为了获得高考加分，如何更改户籍和民族身份的内幕操作。一位学生在调查报告中就指出，在更改少数民族身份的过程中，实际上存在着隐性的“潜规则”，“学校和老师、考生、考生家长和官员体系存在‘共谋’。既然大家都在造假，大家都有机会加分，即使一些考生有机会反映，也会被平息下来。”

而因为各省市的录取分数存在差异，一些家长和考生便走上了高考移民的路子。比如受访的北大学生小Y便在高考前从河北移民到天津，而在他们班上，有十几个高考移民的学生。书中揭露的高考移民的方式除了花钱买房，还有花钱办假户口托关系等等。驱使家长和考生铤而走险的便是地域间巨大的录

取差异。书中举例说，有的学生在河北省高考可能连专科都考不上，但是在天津就可以考个不错的二本，甚至二本。对于那些创造了高考神话的超级考生，书中也有对其管理方式的详细介绍。书的作者便揭示了衡水中学精确到每一分钟的教学管理，其中提到的细节让人触目惊心：有的学生睡觉不脱衣服，因为早上没有时间叠被子，而高中三年没有脱过衣服睡觉的学生竟然不在少数。

也正是基于学生的调查与自己的思考，郑也夫写作了《科场现形记》的姊妹篇《吾国教育病理》。在这本书中，他痛斥现在的“学历军备竞赛”，并指出目前高学历者严重过剩的情况下，依然有那么多人争相获取高学历乃是一场诡异的合谋使然。“学生们谋求更高的学历，来竞争社会地位。管理者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学历，以捞取政绩。”在郑也夫看来，教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和社会需求不对等，很多高学历者面临失业的风险。在此基础上，他建议应该学习德国人搞教育分流，做好职业教育。这除了要改革教育本身，还要在社会上多方面进行配套。“就社会而论，德国人建立了枣核型社会，技工的收入与社会地位不逊于大学学历持有者，故很多中小学生会愿意分流到职业学校。我们的户籍壁垒，白领与蓝领在收入与社会地位上的悬殊差距，是职业教育没有吸引力，无法促成分流的基础原因。”



【相关阅读】



【读书会预告】

与林少华先生
一起聊聊村上春树吧

村上春树的新书《没有女人的男人们》刚刚推出中文版。今天下午，齐鲁晚报、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著名翻译家林少华先生做客济南品聚书吧，参加“青未了读书会”。

在读书会现场，林少华老师将与读者交流他多年来翻译村上作品的心得，作为《没有女人的男人们》的译者之一，他也会对这部作品进行深入解读。

时间：6月13日下午2:00—4:00

地点：济南品聚书吧（济南恒隆广场东塔4楼）



悦读·分享

扫码关注
齐鲁晚报副刊微信“青未了”